



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系列丛书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eries

王 芳 著

中印开放与增长的路径比较：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Path for Openness and
Growth in China and India:
Insights from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系列丛书

中印开放与增长的路径比较： 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印开放与增长的路径比较：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王芳著.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1
(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5095 - 1138 - 1

I. 中… II. 王… III. 比较经济学 - 中国、印度 IV. F12
F1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9803 号

责任编辑：张 铮 责任校对：张全录
封面设计：耕 者 版式设计：兰 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100142

发行处电话：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6403343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7.625 印张 200 000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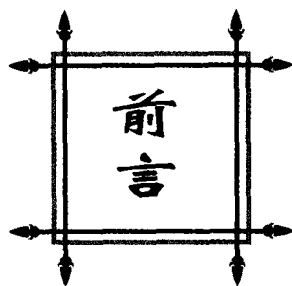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1138 - 1/F · 0958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010 - 88190744



历史上，中国和印度经济基础非常相似，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先后走向开放，开始了大国的崛起之路。然而，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的路径差异恰恰出现在开放之后，如果可以单纯地用开放与经济增长的联系机制来解释这一差异，那么两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应该趋同而不是趋异，为此，笔者推测，并非开放直接导致了这些差异，而是更深层次的原因作用于开放与经济增长的联系机制的链条，改变了开放影响经济增长的效果。通过进一步研究，笔者发现是两国开放的制度环境的差异最终导致了两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差异，而在制度环境中不是单个制度而是制度配合影响了两国的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

本书由 8 章组成，第 1 章引言部分提出了本论题的研究意义，并对相关文献从五个方面作了详细的总结，这些文献综述构成本书研究的第一个理论框架。

在第 2 章的分析中，按照笔者的研究思路，提出了开放和制度的经典研究框架，界定了“开放”和“制度”在本书的研究中的内涵，并总结了不同类型的开放，以及制度与经济增长在理论上的

联系机制；区分了制度框架中的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制度创新、制度变迁以及路径依赖等概念；着重指出了制度改进秩序的功能；区分了制度与政策的区别和联系。

因为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一是用于解释长期的经济增长，在本书的第3章则通过回顾两国开放前的历史和制度环境，总结出影响开放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此处隐含的问题反映了笔者的一个观点，即正是由于这些路径依赖的锁定作用，决定了两国在开放后的经济增长路径的差异。

第4章对中国和印度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分为三个部分进行梳理：（1）经济增长的对比，包括经济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和产业结构的差异；（2）开放程度的对比，包括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两部分，其中对于商品贸易的进出口格局细化到SITC（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两位数的层次，对于服务贸易，也根据WTO数据库中的分类细化到行业和部门；另外特别总结了两国软件业出口的数据；（3）外资流入的对比，从流入数量、行业、来源地和组成四个方面进行对比。

第5章和第6章是本书的核心部分，通过两国开放的制度环境的对比，分离出开放与制度的联系机制。在第5章的分析中，首先论证了制度与政策的区别和联系，然后根据已有的“政策互补”（Policy Complementarity）的思路构造了“制度配合”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来自Acemoglu等（2001）对殖民地国家的起源的研究和Djankov等（2004）通过研究产权配置的极端状态“无序”和“专制”而提出的“制度可能性边界”（IPF）等两维制度配合框架的启发，并吸取Gallego - Loayza（2002）Calderón and Fuentes（2005）对拉丁美洲研究使用的“政策互补”框架，通过计量经济学中的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出影响中国和印度的不同制度配合的集合，即公共因子，进而通过比较这些公共因子的经济意义来说明两国制度环境的差异。最后一节是动态分析，简要分析开放对制度变

迁的作用渠道,以及后者如何影响改革开放的渐进性。

第6章结合具体的贸易开放、金融开放和投资环境,比较两国的制度环境,以及这些制度环境如何影响这些具体部门的开放效果。其中,外资是对制度环境最为敏感的一种开放,不仅需要宏观的制度环境的契合,更需要微观环境的制度基础,即“投资环境”。本章根据两国的特点将制度区分为三个维度,详细分析了投资环境对中印两国产业结构形成的影响。探讨了两国服务贸易的制度环境差别,进而对目前中印比较中的热点问题,两国软件行业发展的差异提供了解释。在讨论金融开放的制度环境时,引入了对金融开放与金融发展关系的考察,探讨了为何相对贸易开放而言,经济增长对金融开放的敏感度更低等热点问题。

第7章从两个层次对制度与经济增长的近因进行实证检验。首先按照 Hall-Jones (1999) 使用的“劳动增进型”生产函数对两国进行产出分解,计算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然后,构造时间序列,比较各种制度和制度配合对两国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影响,为了说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以及长期稳定关系,该节先后对回归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并对 OLS 回归结果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来判断协整关系。

第8章为结论和未来的研究问题。通过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的研究,本书探讨了中印开放与增长路径和效果的差异及原因,并提出了一个中心命题:并非开放直接导致了这些差异,而是开放的制度环境作用到开放与经济增长的联系机制的链条,导致了两国开放影响经济增长的效果的差异。而且,在制度环境中不是单个制度而是制度配合作为深层次原因影响了两国的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这些经济增长的“近因”,进而导致中印两国增长路径和效果出现差异。

从研究的方法上来看,本书是一部规范的经济学研究著作。然

而笔者的出发点依然是解释目前中印经济比较讨论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作为两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独特的，中国“新颖”的开放路径和印度“异类”的增长路径正在唤起人们对经济增长的重新思考。经济增长现象虽然可以用数字来简单描述，但是原因却是复杂的，甚至很多时候超出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无论如何，对于两个制度对经济生活影响之深的国家，本书选取的研究视角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

不同于以往的制度分析方法，本书的一个重要创新点是在对现有理论文献从一个新的角度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配合”的概念，强调各种制度如何在开放的条件下相互配合，对开放与经济增长的联系机制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开放的效果，从而为比较跨国（特别是两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差异提供一个相对完整、有效的制度分析框架。

据此，我们可以对比较容易地对当前困扰中印比较问题中的几个难题作出初步解释。比如，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快于印度，以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例测度的贸易开放度也明显高于印度，外资流入是印度的十倍？从制度配合的角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个原因。

印度虽然有民主的政治体制、相对中国更健全的法律体制，但是在市场制度方面表现为僵化和顽固。在中国和印度这样劳动力作为丰裕要素的国家，外资一般会流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非熟练劳动为主体的产业将具有更大的获利空间。中国正是靠制造业的外资流入，实现出口和经济绩效的卓越表现。而印度的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由于受《劳资争议法》的保护，造就了一大批劳动贵族，不仅生产效率低下，而且阻碍了其他工人进入制造业部门，更无法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这里，健全的法律体制与民主、劳动力市场监管制发生了不恰当的配合，不仅影响了开放的效果，也加大了制度变迁的难度。

相反，软件行业的发展却需要不同的制度配合，如高技术含量、健全的法制和金融制度、良好而悠久的教育制度等。而恰恰这些制度在印度比较健全、制度配合相对完善，加上国家产业发展目标带来的优惠政策，使软件行业的外资能在这些制度的配合下，与印度的低成本的、讲英语的熟练劳动力群体等要素禀赋相结合。另外，来自印度本土发展迅速的软件企业创造的竞争环境，引致高质量的外资流入软件部门，推动了“软件大国”的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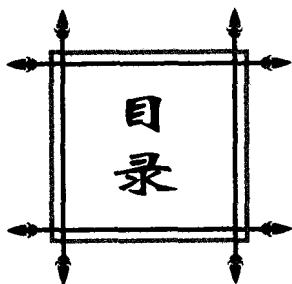
外资流入是受非正式制度影响最深，因而也是对制度环境最为敏感的开放形式之一。由于殖民地的阴影和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自力更生观念，印度在对外资开放上设置了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的三重防护体系。其中，允诺开放但又同时制定例外条款构成了正式制度方面的最主要的防护体系。正式制度方面的防护体系还包括《外汇管理法》遗留下来的要求技术输入的传统，对外资的技术投入加以限制。在非正式制度和制度的执行方面，无效率的磋商机制和僵化的审批制度抑制了外国投资者的热情。这些制度配合在一起效果更为强烈，成为印度外资流入的天然屏障。

本书的另一个创新之处是笔者通过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发现，在开放前，两国的各项制度基础即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如印度靠许可证实施的管制体系、制度形成的调和主义特征、中国的政企职责不分造成的国有企业效率的低下等，这些旧制度所规定的社会运行范式对制度变迁的方向与速度具有锁定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些路径依赖的锁定作用，决定了两国在开放后的经济增长路径的差异。

开放后，上述制度基础锁定了两国制度变迁的方向，从而使两国的制度环境和变迁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比如，在贸易领域，中国贸易开放的制度环境和变迁深深地刻上了转型的烙印，反映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特征。而印度由于其特有的自力更生、僵化的、调和的以及要求共识的制度环境和变迁模式，制约了其在 WTO 框



架下开放的速度和程度。再如，在渐进性改革和开放的问题上，由于两国固有体制造成的政府作用不同，中国的渐进性与制度转型密不可分，而印度追求“技术性共识”的制度选择特征往往导致政府主导的诱致性变迁的失效。这些制度差异最终导致两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法驶向统一的方向。



第1章 引 言	(1)
1.1 问题的提出	(1)
1.2 相关研究现状	(6)
1.2.1 制度与经济增长：一个历史回顾	(6)
1.2.2 开放与经济增长：一个历史回顾	(8)
1.2.3 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的关系：一个综述	(9)
1.2.4 开放、制度与经济增长：经济学研究的新 进展	(10)
1.2.5 中印经济增长差异的比较：研究现状与问 题	(24)
1.2.6 文献综述总结性评论	(25)
1.3 本书研究的方法论和研究意义	(27)
第2章 开放与制度的理论框架	(32)
2.1 “开放”的界定及相关理论框架	(32)
2.1.1 “开放”在本书的界定	(32)
2.1.2 “开放”与经济增长的联系机制	(36)

2.2	“制度”的界定及相关理论框架	(38)
2.2.1	“制度”的界定	(38)
2.2.2	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的概念界定	(41)
2.2.3	制度与秩序	(46)
2.2.4	制度与政策	(49)
第3章	中印开放与增长路径差异的历史渊源比较：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51)
3.1	印度开放前历史背景的制度分析	(52)
3.2	中国开放前历史背景的制度分析	(57)
第4章	中印开放与增长路径差异的典型事实	(61)
4.1	开放后中印经济增长的对比	(62)
4.2	中印贸易开放程度的对比	(64)
4.2.1	中印总体贸易开放程度对比	(65)
4.2.2	中印进出口格局对比	(67)
4.2.3	中印服务出口状况对比	(70)
4.3	中印外资流入状况的对比	(72)
4.3.1	中印总体外资流入状况对比	(72)
4.3.2	中印外资流入分行业对比	(74)
4.3.3	中印外资流入分来源地和结构对比	(79)
第5章	开放对中印经济增长路径差异的影响：制度配合与制度变迁	(82)
5.1	开放与制度的联系机制——初始分析	(82)
5.1.1	Acemoglu 等关于开放——制度关系的分析路径	(83)

5.1.2	Djankov 等关于制度配合与制度选择的分析 路径	(86)
5.2	开放与制度配合——静态分析	(88)
5.2.1	制度配合的研究现状与问题	(89)
5.2.2	模型、方法和数据处理	(93)
5.2.3	分析结果说明	(107)
5.3	开放与制度变迁——动态分析	(110)
5.3.1	利益集团理论及中印利益集团形成的制度 基础	(112)
5.3.2	中印制度选择与渐进改革开放的动态分析	(115)
第 6 章	中印开放的制度环境比较	(120)
6.1	中印贸易开放的制度环境比较	(121)
6.1.1	中印贸易开放的进程比较	(122)
6.1.2	中印贸易开放的效果分析	(124)
6.2	中印投资环境与制度环境比较	(127)
6.2.1	中印投资环境的数据对比	(128)
6.2.2	中印投资环境的制度分析	(130)
6.3	中印服务贸易和金融开放的制度环境比较	(138)
6.3.1	中印服务贸易开放的制度环境比较	(138)
6.3.2	中印金融开放的制度环境比较	(147)
第 7 章	中印制度对经济增长“近因”影响的实证检验 	(157)
7.1	物质、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中印经济增长的 影响检验	(158)
7.1.1	产出的分解	(159)

7.1.2	数据说明和人力资本的计算	(161)
7.2	制度与物质、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关系的时间序 列检验	(170)
7.2.1	模型、数据说明和估计结果	(171)
7.2.2	结果分析	(177)
第8章	结 论	(182)
8.1	主要结论	(182)
8.2	未来的研究问题	(187)
附录A	印度的贸易改革	(190)
附录B	中国的贸易改革	(192)
附录C	印度服务业——选择部门的开放	(194)
附录D	1990年以来中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	(195)
附录E	1990年以来印度的金融自由化进程	(197)
附录F	中国和印度劳均产出的分解 (WDI)	(199)
参考文献		(201)
后 记		(225)



第1章



引

言

归根结底，通过制度的演化，人类世界从一种无序的自然状态演变为有序的现代社会。这是一个随机过程，以至于我们所观察到的实际发生的一切仅仅是制度轮转的一次轮回而已。唯一的问题是，这个轮转是否偏斜。

Andrew Schotter (1981)



1.1 问题的提出

中国和印度都曾是泱泱大国，文明古国。根据 Maddison (2001) 的统计，直到 19 世纪早期，中国和印度还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两个国家。两国的 GDP 之和占世界 GDP 的 50%，科技发明也层出不穷；而在近代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又同时出现“李约瑟之谜”（*The Puzzle of Needham*）。^① 1840 年鸦片战争把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印度则是亚洲最早被殖民和最彻底

^① 即现代科学为什么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Needham, Joseph (1964),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Science and Society*, 1964, 4: 385–408.

被殖民的国家，1609年起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沿海建立移民据点，1757年开始向内陆扩张领土，1858年英国政府正式接管印度的统治。资料显示，中国和印度都曾经非常深入地卷入了第一次全球化的浪潮，尽管形式和内容是非常惨痛的。^①二战后，印度和中国先后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并确立了基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印度移植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并将苏联的计划经济改造吸收，创建了“混合经济”体制。中国则实行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和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政策上，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国分别采取“进口替代”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国先后走向开放，经济增长率迅速提高，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处于醒目的位置，开始了大国的崛起之路。

在经典理论“纯经济”的考察中似乎不足以区分出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差异，以至照这样的趋势看下去，中印的前世、今生以及未来都将毫无悬念地相似下去。然而，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的路径差异正在不断吸引全世界的眼球，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步放稳和印度经济20年来的持续增长（除去1991年危机年份），理论界逐渐把研究的视角从对两国共性的研究转移到对两国增长路径的差异以及增长潜力的分析上。

目前，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基本停留在对两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简单对比或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近因”的解释上，尚未脱离新古典或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如Panagariya（2006）详细分析了两国20年来商品和服务贸易结构、外资流入和经济增长率的差

^① 通常认为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是从1870年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运输业的进步和贸易壁垒的削减是这次浪潮形成的诱因。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大约从1950年持续到1980年，这次浪潮集中在发达国家的一体化进程上。最近一次全球化浪潮始于1980年，运输业发展和通信技术进步相结合，以及大批发展中国家通过开放，其国际贸易以寻求海外投资促成了这次浪潮。

异；Bosworth and Collins（2007）使用了一个简单增长核算框架，详细比较了1978—2004年间两国劳动、资本、教育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对其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以及总经济绩效的贡献度。Fan and Felipe（2005）充分讨论了1980年来两国资本积累、收益率、投资率、资本生产率以及技术过程的模式的差别，并因此得出未来印度主要面临如何提高投资率从而进一步加速增长的挑战，而中国则面临随着投资收益率和资本生产率的下降以及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率的难题。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的确会引起两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差异，但是为什么两个经济背景极其相似的国家在开放后会出现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究竟是开放直接导致这些差异，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几乎从斯密时代开始，经济学家就开始关注开放和经济增长，此后，开放（特别是贸易开放）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一直是国际贸易甚至经济学领域的常青话题。Agenor and Montiel（2004）总结了商业开放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两种机制：首先，在金融开放的前提下，增加商业开放度会带来较大的国内贸易部门，而这就可能降低外部债权人向国内借贷时所要求的风险贴水。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这可能会导致国内经济中较大的稳定状态的资本存量，从而使得转型过程中有更快、由积累所驱动的经济增长。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出口和进口可以增加国内经济与新技术的接触，从而有利于采用新技术并提高生产力增长率。^①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不断纳入开放格局，这些经典结论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基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实情时，结论开始含糊不明。

① [美] 皮埃尔·R. 阿根诺、[美] 彼得·J. 蒙蒂尔：《发展宏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关于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考证和说明，在将制度视为“自然状态”的一部分，因而在被剔除掉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将技术内生化的、而将制度视为外生变量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之外，提出了解释经济增长的“第三种方法”。^① 因而制度、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制度变迁、制度创新这些概念在解释开放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过程中得到很好的运用。例如，在近期关于经济史的研究中，在分析封建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动因时，一个相当普遍接受的解释是：航海术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增加扩大了市场规模，引起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从而引起经济增长质的飞跃。又如，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2) 在解释前欧洲殖民地国家贫富逆转的问题时，充分考察了制度在现代世界贫富格局形成中的作用，认为欧洲人的干预创造了一张“制度安排的颠倒”，在富裕的地区实行掠夺性制度，而在人口稀少的地区为了移民的需要建立起良好的私有财产制度。

制度经济学同样被广泛地应用于近代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研究中，开放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因而有了“新解”。例如，Rodriguez and Rodrik (2001) 在 Dollar (1992) 的回归方程式中加入发展中国家的虚拟变量时，发现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消失，进而提出贸易开放很可能直接影响制度质量，再间接促进经济增长。

上述研究成果对本书要研究的中印开放与增长的路径差异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但是，有三个原因可能会影响分析的效果：

第一，目前理论界对“制度”和“开放”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解，制度的内涵以及开放的范围的差别都可能影响研究

① [美] 西奥多·W. 舒尔茨：“经济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载于 [美] R. 科斯 (Coase, R. H.) 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版。